

分類詞在北方漢語中的演變： 魏晉南北朝與元朝兩個時期的比較*

黃從嘉¹ 李孟璋¹ 徐啟斌² 何萬順^{2, 1**}

¹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²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摘 要

分類詞源於漢語而後影響壯侗語，還是漢語借自壯侗，頗有爭議。支持壯侗的證據之一是現代南方漢語分類詞較北方漢語多，可見是壯侗先影響了南方漢語，再向北擴散。Her & Li (2023) 則論證北方漢語為源頭向南方擴散，但北方漢語後期與阿爾泰語系接觸而產生「阿爾泰化」，分類詞因而減少。本文的目的是以魏晉南北朝與元朝時期的分類詞語料檢驗此項假說。漢語分類詞於魏晉南北朝時期趨於成熟，本文統計此時北方漢語中分類詞的數量，作為比較的基礎。接著檢視受蒙古統治的元朝。兩相比較發現，元代北方漢語的分類詞數量比魏晉時期不減反增，可見元之前的兩千五百年間，漢語分類詞從無到有不斷增長，減弱的趨勢應在元以後發生，尤其是滿族統治近三百年的清朝。

關鍵詞：分類詞，量詞，阿爾泰化，魏晉南北朝，元朝

* 本文由第一作者之碩士論文改寫精進而成，通訊作者為指導教授。感謝《清華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諸多改進建議，使得本文論證更加嚴謹，研究團隊特此致謝，但文責自負。本文研究且受益於通訊作者下列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106-2410-H-029-077-MY3、108-2410-H-029-062-MY3、111-2410-H-029-009-MY3，於此一併致謝。

** 通訊作者電子郵件信箱：onesoon@gmail.com, hero@thu.edu.tw

一、緒論：亞太地區分類詞的起源

量詞 (numeral classifier) 是漢語語族的一大特色，在計算物品時，數詞與名詞之間一般都需要有量詞作為中介。正如同在句法上名詞是單一詞類，但在語意上可分為可數與不可數兩個次類，量詞在句法上也是單一詞類，在語意上也可分出兩個次類：分類詞 (sortal classifier，又稱「個體量詞」) 與計量量詞 (mensural classifier)。例句 (1) 的「顆」、「根」為個體量詞，例句 (2) 的「箱」、「斤」為計量量詞。

- (1) 個體量詞：三顆蘋果和兩根香蕉
- (2) 計量量詞：三箱蘋果和兩斤香蕉

在非量詞語言中，句法上不存在量詞這個詞類，但在名詞中卻有許多計量名詞，在語意上等同量詞語言中的計量量詞，例如英語中的 box 與 kilo，可對應於例句 (2) 中的「箱」和「斤」。本文關注的焦點是分類詞，如例句 (1) 中的「顆」和「根」，分別用於計算球狀與長形的可數名詞，這是非量詞語言中所沒有的。因此，在量詞語言中，如何在量詞中分辨出分類詞，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在量詞中分辨出分類詞的確切標準是：數詞是乘數，量詞是被乘數，而分類詞作為被乘數的值必然是 1，請見例句 (3) (Her 2012)。

- (3) 三隻／條／尾魚 = 3×1 魚

雖然「隻」、「條」、「尾」這三個分類詞所彰顯的語意特徵不同，但其數值相同，皆為 1，因此 (3) 中的三個用法所得到的總數若翻譯成英文的話，都必然是 three fish。反之，凡量詞作為被乘數若其值不必然是 1，則皆為計量量詞。

- (4) 三打玫瑰 = 3×12 玫瑰
- (5) 三窩小貓 = $3 \times$ 窩 小貓

例句 (4) 的「打」是確切的數值 12，所以三打玫瑰必然是 36 朵。但 (5) 中

的「窩」則是不確切的數值，大約介於 2 與 10 之間，所以三窩小貓大約是 6 到 30 隻小貓。但計量量詞的值也可能並非數值，而是重量、長度、體積、金錢、時間等等，不一而足。而其值同樣可能是確切的或是有標準值的，如 (6) 與 (7)，也可能是不確切的或是沒有標準值的，如 (8) 與 (9)。

- (6) 三斤糙米 = $3 \times$ 斤 糙米
 (7) 三尺花布 = $3 \times$ 尺 花布
 (8) 三滴眼淚 = $3 \times$ 滴 眼淚
 (9) 三包水果 = $3 \times$ 包 水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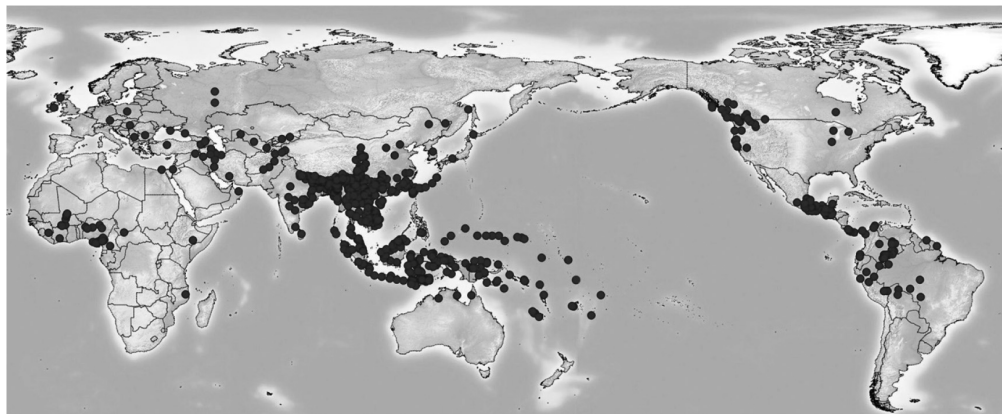
何萬順、林昆翰 (2015: 61) 因此提出了量詞的分類，見表一。量詞的兩大類是分類詞（個體量詞）與計量量詞；後者又可細分為四個次類。

表一：量詞的分類

次類	值	實例
分類詞／ 個體量詞	1	固定數值 1（例如，個、隻、條、本、朵、頂）
計量量詞	-1	1. 固定數值 $n, n > 1$ （例如，雙 $n = 2$ 、打 $n = 12$ ）
		2. 非固定數值 $n, n > 1$ （例如，排、組、群、幫）
		3. 固定非數值（例如，斤、升、碼、分鐘、元）
		4. 非固定非數值（例如，滴、節、份、杯、盤）

Her et al. (2022) 調查了全世界七千多種語言，確認在 3,338 種語言中，大多數 (78%, 2,615/3,338) 沒有分類詞，只有 723 種 (22%, 723/3,338) 有分類詞，其地理分布，請見圖一。

雖然世界各大洲都有分類詞語言，但以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與東南亞，為分類詞語言的熱區。美洲和非洲雖然也有分類詞語言，但密度遠不及東亞和東南亞，分類詞的數量更是遠遠不及。就以語族來看，分類詞語言密度達百分百，且分類詞數量最豐富的是漢語 (Sinitic) 和壯侗語 (Tai-Kadai)。因此，亞太地區的分類詞若有一個單一的發源地，以漢語或壯侗的可能性最高。學界也的確有兩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認為分類詞最先發生於漢語，另一派則認為漢語分類詞乃借自壯侗。



圖一：723 個分類詞語言的地理分布 (Her et al. 2022: 158)

文獻中支持分類詞壯侗語起源論（以下稱「壯侗派」）的學者包括 Jones (1970)、Hashimoto (1977)、Erbaugh (1986)、Adams (1991)、Peyraube (1991)、李若暉 (2000) 等。Huang (2013) 整理出壯侗派的六大理由：一、上古漢語沒有分類詞；二、漢語缺乏動物分類詞；三、在漢語的歷史上，分類詞在句法中沒有固定的位置；四、原始藏緬語沒有分類詞；五、南方漢語中的分類詞比北方漢語多，且部分語法行為與壯侗語相似；六、壯侗是東南亞語言中分類詞系統最為發達的。而支持分類詞漢語起源論（以下稱「漢語派」）的學者包括黃載君 (1964)、張公謹 (1978)、梁敏 (1983)、Wang (1994)、Morev (2000)、Behr (2009)、步連增 (2011) 與最近的 Her & Li (2023) 等。

Her & Li (2023) 對於壯侗派的六項理由一一提出反駁：一、上古漢語已有量詞，且金文中已有分類詞存在的證據；二、漢語中有「隻」、「頭」、「尾」等動物分類詞；三、漢語量詞從古至今皆為「數+量」之詞序；四、原始藏緬語沒有分類詞之事實，與原始漢語有無分類詞無關；五、漢語語族中分類詞南多北少的現象，乃歸因於北方漢語之「阿爾泰化」(Altaicization)；六、壯侗是東南亞語言中分類詞系統最為發達的，但漢語在東亞亦是分類詞系統最為發達的。該文進而提出數項對漢語有利的證據，主張亞太地區的分類詞起源於北方漢語，進而影響南方漢語及其他周邊語族。

本文關注的焦點是，在此一爭議中，當代漢語分類詞南強北弱的事實應如何解釋。壯侗派的解釋是，壯侗語先發展出分類詞，進而影響了鄰近的南方漢語，然後才向北方擴散。北方漢語距離源頭較遠，發展的年代較短，因此分類詞比較不發達。在此推論下，漢語分類詞南強北弱應是自古就一直存在的現象。針對此現象，

Her & Li (2023) 提出的解釋是：因為北方漢語與鄰近之阿爾泰語系語言長期接觸而產生「阿爾泰化」，分類詞的數量及使用由強轉弱正是徵兆之一；換言之，北方漢語分類詞應是從無到有，從有轉強，而後才從強轉弱。本文的目的就在於驗證這個解釋的真實性。

本文的論證架構如下：第二節回顧 Her & Li (2023) 針對壯侗派的六項論點提出的否證與論述。第三節檢視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漢語分類詞的數量，並與現代南方漢語的閩南語及粵語做比較，凸顯魏晉時期北方漢語分類詞甚為豐富的事實。為檢驗阿爾泰化造成分類詞數量下降的假說，本文選擇漢語史上第一個阿爾泰語系統治的元朝為標的，於第四節檢視元代北方漢語分類詞之數量，並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比較。結果顯示北方漢語分類詞數量有增無減，甚且較現代南方漢語更為豐富。此項證據更不利於壯侗派的假設。我們在第五節的討論中推測，北方漢語分類詞的弱化是在元代之後，尤其是在清代滿族統治的兩百七十多年間。第六節是結論與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二、亞太地區分類詞起源：漢語抑或壯侗？

在第一節已提及，壯侗派提出的六大理由為 (10)-(15)。本節將簡要回顧 Her & Li (2023) 所提出的論點。

- (10) 上古漢語沒有分類詞
- (11) 漢語缺乏動物分類詞
- (12) 漢語史上分類詞沒有固定位置
- (13) 原始藏緬語沒有分類詞
- (14) 現代漢語分類詞南強北弱
- (15) 東南亞語言中壯侗語分類詞系統最為發達

(一) 上古漢語的分類詞

Her & Li (2023) 指出，甲骨文中是否有分類詞雖有疑義，但金文中確實已有分類詞的出現，如例 (16) 的「匹」與例 (17) 的「輻」：

(16) 馬四匹

(17) 俘車三十輛

因此，(10) 的說法是不成立的，上古漢語已有少數的分類詞。

(二)漢語缺乏動物分類詞

「動物」在分類詞體系中，是相當重要且基本的一項語義參項（張賴 2012：25）。Erbaugh (1986: 401) 表示，大多數的漢語分類詞，並未嚴格區分人類與非人類，或是動態與非動態。因此不少學者認為漢語中的動物分類詞應該是借用自其他語言。然而，Her & Li (2023) 指出在北方漢語裡有「頭」、「尾」、「隻」等表示動物的分類詞，而這幾個分類詞都源自漢語本身，均非借自其他語言。因此，(11) 的說法也不成立。

反觀南方漢語的動物分類詞反而較少。以閩南語為例，專指動物的分類詞只有計算魚類的「尾」bue，除此之外就是同時用來計算動物、有腳家具、和某些交通工具的「隻」tsiah（陳孟英等 2020：403）。而泰語的動物分類詞 tua 卻可能借自漢語的「頭」，且與閩南語的 tsiah 相似，可延伸用於計算襯衫、桌子、問題、大學科目等（Lu 2012: 96）。除了泰語以外，毛南語亦有一個類似的分類詞，可計算動物與人類的小孩（Lu 2012: 83）。Lu (2012) 認為應該是漢語將此種分類詞傳至泰語和毛南語。漢語本身的動物分類詞原本就有嚴謹和不嚴謹兩類，嚴謹的分類詞只能用於動物，而不嚴謹的分類詞除了動物外，還可用於人類或非生物。後者的用法由北向南傳，傳至東南亞的壯侗語系。

(三)上古漢語分類詞的位置

漢語分類詞的語法在歷史上出現過 (18a-g) 七項 (Peyraube 1998)。其中 N 代表名詞，Num 代表數詞，C 代表分類詞，M 代表計量量詞：

- | | |
|--|-----|
| (18) a. [Num-N] | 一牛 |
| b. [N-Num] | 虎一 |
| c. [N ₁ -Num-N ₂] | 羌十人 |
| d. [N-Num-M] | 貝廿朋 |
| e. [N-Num-C] | 馬三匹 |

- f. [Num-M-N] 一杯羹
g. [Num-C-N] 一株松

Her (2017) 將上述七種語序歸納為四種，因為分類詞 (C) 與計量量詞 (M) 可簡化為一種詞類，而 (18c) 的 N₂ 可視作 C，因此得到下列 (19a-d) 四種語序。

- (19) a. [Num-N]
b. [N-Num]
c. [N-Num-C/M]
d. [Num-C/M-N]

四種語序中，具備分類詞的為 (19c) 和 (19d)，數詞和量詞順序固定為 [Num-C/M]，名詞 (N) 可置於 [Num-C/M] 的前方或後方。但 [N-Num-C/M] 和 [Num-C/M-N] 或可視為兩個不同的句法結構，表達不同的語意。[N-Num-C/M] 中的 [Num-C/M] 是測量物品的謂語，它和名詞組成一個主謂結構的句子，例如在詞組「書三本」中，講者所表達的語意是「書有三本」，因此有可能「三本」是一個空動詞 (covert verb) 的補語 (complement)。至於 [Num-C/M-N] 中的 [Num-C/M] 則是表示數量性質的修飾語，而中心語是 [N]，例如「三本書」是一個名詞詞組，中心語是「書」，「三本」是修飾語 (Her & Tsai 2020)。在之後的發展中，分類詞的必要性越來越高，[Num-N] 與 [N-Num] 的用法逐漸式微，[Num-C/M-N] 的頻率越來越高，在現代漢語裡，除了在清點物品的語境裡可能出現，[N-Num-C/M] 的分布已是非常有限。總結來說，歷史上漢語分類詞與數詞具有固定的詞序，與名詞的先後順序也有規則可循。

(四) 原始藏緬語沒有分類詞

藏緬語和漢語分屬漢藏語系下的兩大分支，根據 Sagart et al. (2019) 的研究，原始漢藏語可追溯至距今七千多年前。原始藏緬語沒有分類詞，表示無法構擬原始漢藏語的分類詞 (LaPolla 2003)。然而漢語派主張分類詞在原始漢語中獨立發展，原始藏緬語沒有分類詞的事實並不構成反證，和分類詞起源的爭論無關。事實是甲骨文中已有計量量詞的出現，金文中即可見少數的分類詞。反觀原始壯侗語，DeLancey (1986) 認為並無法構擬量詞的存在，而最早出現於文字記錄時已是十三

世紀 (Huffman 1973: 505)，比漢語晚了兩千年。

(五)現代漢語分類詞南強北弱

壯侗派的另一項理由是：中國南方的漢語，分類詞數量多於北方的漢語。通常一種詞性的起源地，其單詞的數量較多，規模較大，因為其發展的歷史較長，有較多時間發展出新詞。若分類詞源於漢語語族語言，在其發源地，即華北地區，應當要有最多的分類詞。然而，現實中的情況卻是華中與華南的分類詞多於北方。橋本萬太郎 (1985) 曾於《語言地理類型學》一書中，比較漢語語族各語言和方言的分類詞。結果發現：越往北方，分類詞漸漸變得單純化。尤其在北京方言中，任何物品大致上皆可用「個」一詞概括之。在同為北方官話方言的東干語裡，分類詞僅剩下一個「個」字。

現實中的語言使用情形，北方官話的分類詞，其使用上的必要性的確不如南方官話與其他華中、華南的語言。比方說，在臺灣的閩南語和客語中分類詞是不可省略的。反之，在一些場景設定於北京的電影中，例如《非誠勿擾》與《老炮兒》，其對話就常省略分類詞，如 (20)。

(20) 頤和園後邊有一野湖。

Her & Li (2023) 認為，漢語的分類詞之所以產生今日北少南多的現象是因為華北地區受使用阿爾泰語民族的影響，分類詞規模縮小，數量減少。尤其蒙古人與滿人都曾南下入主中國，定都北京。LaPolla (2010) 將此種現象稱作阿爾泰化。至於華中與華南因受阿爾泰化的影響較少，所以依然保留許多分類詞，造成現代漢語南強北弱的現象。McWhorter (2007) 則提出了更深一層的見解，認為北方漢語受外族語言影響並同化的過程，可追溯至南北朝之後的隋唐時期。

(六)東南亞語言中壯侗語分類詞系統最為發達

南方漢語分類詞的發達程度不亞於壯侗。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壯侗語分類詞有一特色，就是有大量的回響型分類詞。這只能出現在 [N-Num-C] 的結構中，分類詞與名詞同形，例如泰語中的 *bpra-tet saam bpra-tet* 「國三國」，而泰語中有多達五百個名詞可以當作回響型分類詞 (Jenks 2011)。一個成熟的分類詞系統代表可數名詞在抽象概念上的分類，大量的回響型分類詞表示許多名詞還沒有融入

到更普遍的分類結構中，可以視為一個語言的分類詞系統還在成熟化的跡象。

在漢語的發展過程中，早在商代上古漢語的金文中即大量出現回響型分類詞，例如，「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而 [N-Num-C] 的結構在魏晉之後才逐漸為 [Num-C-N] 所取代（蔣穎 2009：118-129）。吳福祥等（2006）認為 [N-Num-C/M] 自甲骨文中即用於清單類的語域中，而 [Num-C/M-N] 則是從早期即存在的「數詞＋單位量詞＋之＋名詞」結構演變來的，例如，《孟子·滕文公上》「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中的「五尺之童」。因為「之」的脫落而誘發「數詞＋單位量詞＋名詞」獲得實際計量的功能，進而演變出分類詞。

因此，壯傣語中回響型分類詞的存在和名詞在前為主的語序表明壯傣語的分類詞正在發展的較早階段，現代漢語沒有回響型分類詞以及現代漢語的語序以 [Num-C/M-N] 為主可看作是分類詞發展成熟的跡象。而現代漢語也是東亞語言中分類詞系統最為發達的。

綜上所論，在漢語與壯侗之間，目前的各項證據較為支持漢語先發展出分類詞的論點。但是對於現代漢語分類詞南強北弱的解釋，也就是北方漢語的分類詞在數量上並非自始即弱，而是由強轉弱，這仍需要進一步證實。

三、魏晉南北朝北方漢語分類詞的數量與現代南方漢語的比較

本節之第一小節先釐清魏晉南北朝北方漢語分類詞的數量，在第二小節中與現代閩南語與粵語兩個南方漢語做比較，以顯示魏晉時期的分類詞數量已是相當豐富。張楨（2012）的《類型學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將研究範圍設定在漢朝至明朝，將分類詞分為五類：形狀、屬性、功用、通用、次通用。其中「形狀」又分為圓形、環形、長形、面形、塊狀、部位代整體、外形相似、組合特徵、使用特點等小類；而「屬性」大類又分為動物、植物、人等小類；「功用」大類又分為書籍文章、衣物織品類、交通工具、文化事物、建築物處所、抽象事物、日用事物、其他等小類。另一方面，所謂「通用分類詞」就是可計算的物品無法歸納為任何一項類別的分類詞，如現代漢語的「個」，基本上可用於絕大多數的物品，特別是在非正式的口語場合。至於「次通用分類詞」則是用法與「通用分類詞」類似，但使用頻率不如通用分類詞的分類詞。本文將以此分類法，將不同文獻所收錄的分類詞進行統一的分類。

本文從劉世儒（1965）的《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張楨（2012）的《類型學

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王力 (2013) 的《漢語史稿》、鄭邵琳 (2013) 的《魏晉南北朝石刻名量詞研究》等文獻中收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分類詞，並且加以綜整如下。

(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之分類詞

1. 形狀（長形）

條：原本用於量樹木，後用於量長條形事物，又可量「條理」性質的事物。

(21) 條屬者通取一條繩，若布內武，垂下為纓（《禮記·雜記》鄭注）

莖：原意是「植物的莖幹」，在南北朝時代成為分類詞，可用於量人身上的毛。

(22) 右手大姆指下生毛九莖（北齊《魏書·靈微志》）

支：本作「枝」，但與「枝」不同之處在於「支」可以計算任何分節或分支的物品，一節就是一支，而「枝」只能計算長條物。

(23) 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蓮社高賢傳〉）

枝：原意為「樹枝」，可計算一般條狀物。

(24) 威儀有……戟二枝（北魏《洛陽伽藍記》）

道：原本指「道路」，作為分類詞也用於計算道路，進而引申量「門」或「橋」，因為它們有道路可以通行。另一方面由於道路是長條形的，所以也可以計算長形物。

(25) 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北魏《十六國春秋輯補·後趙錄》）

2. 形狀（面形）

張：取「弓箭張開時」的模樣，魏晉時可用於紙、皮、弓箭。

(26) 但將取紙三百張，筆十管（東晉《搜神記》卷2）

面：原意是「臉面」，作為分類詞時可量平面的物品。

(27) 鄴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既此城之西隅（北魏《水經注》卷31）

幅：原意是「布帛」，作為分類詞時，取其形狀特徵，可計算片狀的物品。

(28) 蜜香紙……大秦獻三萬幅（西晉《南方草木狀》卷中）

3. 形狀（塊狀）

塊：原意是「土塊」，也作「𡵓」。在南北朝時期也寫作「顆」，但還是用於計算塊狀物。

(29) 北土通呼物一𡵓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北齊《顏氏家訓·書證篇》）

4. 形狀（圓形、環形）

丸：原意是「圓形之物」，在分類詞上，也用來計算球形物。

(30) 仙人王喬，奉藥一丸（曹植〈善哉行〉）

粒：原意是「米粒」，可計算小而圓的物品。

(31) 君無半粒儲，形影不相保（傅玄〈災旱詩〉）

顆：原本的意義是「小頭」，引申為計算圓形物品的分類詞。

(32) 龍眼……一朵五六十顆，作穗如葡萄（西晉《南方草木狀》卷下）

5. 屬性（動物）

匹：該詞可用於計算馬匹與布匹，然而後者於魏晉已演變為度量衡量詞。用於馬匹的例句包括：

(33) 馬十匹，金銀千兩，縑數千段（北齊〈劉悅墓誌〉）

頭：人和動物的最上部，相對於其他部位更突出，藉由轉喻變成動物分類詞，魏晉可用於大型動物、小型動物。

(34) 恆以驢數頭運糧上山（北魏《洛陽伽藍記》卷5）

隻：原意是「一隻鳥」，除了鳥類外，後來還可以計算獸類。

(35) 孔雀群飛……王家恆有千餘隻（北齊《魏書·鄯善國傳》）

6. 屬性（植物）

根：原本是「植物底部器官」，是生長的關鍵，因其重要性而以部分代替全部成為分類詞。

(36) 造石井一口，種樹兩十根，以息渴乏（東魏〈李顯族造像碑〉）

科：六朝時產生，量草本植物。

(37) 三莖作一科，相去八寸（東魏《齊民要術》卷5）

株：魏晉產生的分類詞，在近代漢語之前是最常用的植物分類詞。

(38) 江南朝士，……未嘗……耘一株苗（北齊《顏氏家訓·涉務篇》）

朵：用於計算花朵。

(39) 其花深紅，……日開花數百朵（西晉《南方草木狀》）

本：原意為「植物的下部」，作為分類詞時，常用於計算草本植物，木本植物較少。

(40) 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北魏《十六國春秋輯補·前燕錄》）

挺：原意是「植物的莖幹」，用來計算植物，亦可計算蠟燭，又寫作「挺」。

(41) 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北齊《魏書·李孝伯傳》）

樹：原本用以計算植物，南北朝以後漸漸被「株」、「根」取代。

(42) 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北齊《魏書·食貨志》）

7. 屬性（人）

人：經常用於統計的場合，在特定場合中，與「個」相當，此時期用例相當多。

(43) 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畢陳王陵，各賜休二百日（三國魏〈曹植墓建墓碑〉）

名：此分類詞由「名稱」意轉來，在魏晉時期還不常作為分類詞。

(44) 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北齊《魏書·禮志》）

員：本意是「物數」，到了秦漢大多用來稱呼「人」，南北朝開始變為分類詞，不過此時大多用來計算「生徒（生員）」。

(45) 立學館雞籠山，置生徒百員（〈蓮社高賢傳〉）

8. 功用（書籍文章）

卷：原為「捲曲」，後用於書簡、書籍（古時書簡可捲曲），後來演變為計算書籍的分類詞。

(46) 撰《話林》數卷（北魏〈鄭羲下碑〉）

篇：原為「竹簡」，後引申為「首尾完整的詩文」，並演變為計算書籍的分類詞。

(47) 輒奉詔竭愚作詩一篇（西晉〈上關中詩表〉）

首：原意為「頭」，可用於計算有開頭的事物，如詩文。

(48) 登雲峰山，論經書一首（北魏〈論經書詩〉）

本：漢代用於量植物，魏晉以後變成量書的分類詞。「本」作為量書的分類詞，其原意為「本源」，因古人傳書各有所本。

(49) 河北此書家藏一本（北齊《顏氏家訓·書證篇》）

冊：原意為「簡冊」，上古時代沒有紙，字都寫在竹簡上，幾片竹簡編在一起就成「一冊」，故用於量冊。

(50) 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北齊《魏書·禮志》）

封：原意是「封閉」，分類詞即是取其「封裝」之意計算書信。

(51) 子淵附書一封（北魏《洛陽伽藍記》）

條：簡牘時代的「一條」原指「單片竹木簡」，後引申為「分條書寫」，側重分項列舉。

- (52) 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瑞數十條（南梁《宋書·本紀第二·武帝中》）

9. 功用（衣物織品類）

腰：另作「要」，人體的部位，連接上下半身，通過轉喻，用來計算繫於腰間的衣物。

- (53) 青綢紫綬，十腰銀艾（東魏〈叔孫固墓誌〉）

領：本意是「衣服領子」，很早就作為分類詞，但不侷限於量衣服，還可以量盔甲、被子。

- (54) 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北齊《魏書·臨渭苻健傳》）

10. 功用（交通工具）

乘：原意為「乘車」，進而引申為「乘坐的交通工具」。

- (55) 人中石像兩區，寶車一乘（北齊〈魯思明等造像記〉）

艘：用來計算船隻。

- (56) 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北齊《魏書·尉元傳》）

11. 功用（文化事物）

軀：原意為「身體」，後來用於計算造像，以及和「造像」有類似宗教意義的「塔」，有時亦寫作「區」。

- (57) 南皮范國仁，敬造彌勒尊像一軀（北魏〈范國仁造像記〉）

龕：原為「容納東西的地方」，作分類詞時計算神像，又寫作「堪」、「勘」。

(58) 沙門璨，敬造石像一堪（西魏〈沙門璨銘〉）

尊：原為「一種祭祀用的酒器」，引申為「尊敬」，並以此衍生為分類詞，並用於造像。

(59) 趙氏迎得白玉像三尊（東魏〈李次明造像記〉）

曲：「曲」作為分類詞是由其「曲折宛轉」之意演變而來，後來演變為計算樂曲的分類詞。

(60) 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音歌五十曲（北齊《魏書·樂曲》）

12. 功用（建築物處所）

所：原意為「伐木聲」，後來衍生為「處所」意，並由「處所」意衍生為分類詞。

(61) 佛弟子李磨侯，敬造鎮池寺一所（北齊〈李磨侯造像記〉）

處：原意為「棲息」，因棲息需用到一定的空間，故衍生為「處所」，並由此意衍生為分類詞。

(62) 掃石置五處仙壇（北魏〈太基山銘告〉）

區：原為「藏匿」，進而引申為「處所」，並用來計算建築物。

(63) 有靈井三區，忽然自成（北魏〈山公寺碑頌〉）

間：原意為「間隔」，房屋中有間隔，一隔為一間，進而引申為分類詞，可用來計算房子、宮殿、館、閣等有隔間的建築物。

(64) 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北齊《魏書·高允傳》）

幢：原本指「旌旗」，因軍營中插有旌旗，故在分類詞中用來計算軍營。

(65) 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北齊《魏書·蠕蠕傳》）

13. 功用（日用事物）

牀：原意是「坐具」和「臥具」，南北朝時可用於計算屏風和弩，因為屏風安置在牀（底座）上，而弩有弩床。

(66) 武衛三百乘，弩一牀（北齊《魏書·源賀傳》）

鈕：本意是「印鼻兒」，並引申為計算印璽的分類詞，又作「紐」。

(67) 賜丕金印一紐（北齊《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傳》）

孔：本指「洞孔」，大多用於計算可穿洞的珠子。

(68) 貢白珠五千孔（西晉《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牒：作為分類詞是由「折疊」意轉來，可用於計算需折疊的屏風。

(69) 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唐《北史》卷24）

14. 通用

枚：「枚」的原意是「樹幹」，但其作為分類詞卻是一開始就是通用分類詞，主因是其「分類詞」的意義是由「計數工具」演變而來。意義演變順序為「樹幹」→「計數工具」→「分類詞」。

(70) 土中得玉璧七枚（北魏《水經注》卷25）

15. 次通用

口：人與動物進食的器官，一人即有一口，以局部代替整體，由名詞轉變為分類詞，後來「口」亦可用於計算有口的無生物。

(71) 水南十里，有井數百口（北魏《水經注》卷 24）

件：「件」的原意是將「物」分塊，引申為計件用的分類詞，純粹表示物品的件數而不強調物品特徵，不過此一分類詞在魏晉南北朝還在初步發展階段，用例不如此時的通用分類詞「枚」。

(72) 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北周宇文憲〈上武帝表助軍費〉）

本小節總結，魏晉南北朝時的分類詞共收集有 52 個。

(二)現代閩南語和粵語之分類詞

陳孟英等 (2020) 檢視了臺灣閩南語的分類詞及量詞，找出了「尾」、「个」、「項」等 65 個分類詞，以及「目」、「面」、「坎」等 18 個分類詞與量詞兼具的詞，建立了一個包含 83 個現代臺灣閩南語的分類詞清單。Huang et al. (2024) 檢視了香港粵語的分類詞及量詞，找出了「丁」、「本」、「件」等 31 個分類詞，以及「支」、「把」、「度」等 13 個分類詞與量詞兼具的詞，建立了一個包含 44 個現代香港粵語的分類詞清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現代北方官話的分類詞大量減少，但是在型態學上屬於北方官話的臺灣華語，在語文教育普及以及與閩客語大量接觸的影響下，卻有高達 85 個分類詞（何萬順、林昆翰 2015）。

若比較魏晉南北朝及現代南方漢語的分類詞數量，可以發現現代臺灣閩南語的分類詞數量比魏晉時期的北方漢語要多出 31 個，但是現代香港粵語的分類詞數量卻比魏晉時期的北方漢語稍微少了 8 個。因此，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早於魏晉南北朝時代，北方漢語分類詞的數量就已經相當豐富了。這與分類詞乃由壯侗語北傳的假說完全不合。

北方漢語從魏晉時期，大量使用分類詞的情形，發展至今弱於南方，期間必然經過一個衰減的過程。依 Her & Li (2023)「阿爾泰化」的假說，此一衰減的過程應

發生在密集與北方民族接觸的時代。本文以中國第一個完全受外族統治的元代作為研究目標。下一節將繼續探究元代分類詞使用的狀況，以檢視此一過程。

四、元朝時期北方漢語分類詞的數量

有關元代漢語的分類詞，本文詳細檢視彭文芳 (2001)《元代量詞研究》、白冰 (2001)〈宋元時期個體量詞的變化和發展〉，以及張頴 (2012) 的《類型學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等文獻，收集出現於元代文獻的分類詞，並以張頴所使用的分類，進行分門別類。以下的例句出處，部分使用簡稱：《全元文》（以下簡稱「文」）、《全元戲曲》（簡稱「戲」）、《全元散曲》（簡稱「散」）、《全金元詞·元詞》（簡稱「詞」）、《元詩選》初集、二集（簡稱「詩初」、「詩二」）、《歷代筆記小說集成》（簡稱「筆」）。

(一)元朝時期北方漢語的分類詞

1. 形狀（長形）

條：原為「小枝條」，魏晉開始作條狀分類詞，也可量條理之物。

(73) 孫仲謀獨占江東地，請喬公言定三條計（元曲《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柱：量山。

(74) 一柱華峰（詞 659 王惲）

杆：量有杆之物。

(75) 他一騎馬一杆槍沖突將來（戲三 772 尚仲賢）

管：量筆、鎖等管狀物。

(76) 一管筆拗曲直 (戲三 176 岳伯川)

竿：原為「竹子的主幹」，唐代開始計算長條物，元代還可用於計算長形影子。

(77) 四周山一竿殘照里 (馬致遠《壽陽曲·山市晴嵐》)

根：原為「植物底部器官」，本來作為分類詞時，只用於量植物，到了元代可用於長條物。

(78) 一根草與你添一歲壽 (戲一 658 高文秀)

2. 形狀 (圓形、環形)

顆：魏晉即有分類詞用法。

(79) 荷盤敲雨珠千顆 (散 825 張可久)

粒：原意是「米粒」，作分類詞時量小而圓的物品。

(80) 若吞卻一粒金丹 (散 469 范康)

丸：量球狀物。

(81) 入關應笑一丸泥 (詩初 629 袁桷)

輪：本意為「車輪」，後來用來計算日月等圓形物。

(82) 一輪紅日為誰藏 (戲一 658 高文秀)

3. 形狀 (塊狀)

塊：原意是「土塊」，可計算塊狀物。

(83) 枕一塊頑石（散 1435 劉庭信）

方：南北朝出現量詞用法，用於量地，唐代開始通用化。

(84) 織春愁一方柔玉（散 1054 徐再思）

駝：作為分類詞用法近「塊」。

(85) 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文一 171 宋子貞）

4. 形狀（面形）

片：原意是「木片」。

(86) 一片相思木，聲含古塞秋（詩初 1296 宋無）

面：作為量詞時可量平展之物。

(87) 一面旗雞學舞（散 544 睢景臣）

張：魏晉開始計算可張開之物，元代的用途很廣。

(88) 費紙數千張，而終年不絕（文五 225 胡祇遹）

5. 形狀（外形相似）

峰：量石頭等類似山峰的東西。

(89) 吾友中丞王君買宅蘇門，得奇石一峰（文六 647 王惲）

6. 屬性（動物）

匹：「匹」在元代維持了其在魏晉的意義，用於計算馬。

(90) 及賜公牧馬百匹 (文二 268 王盤)

頭：漢代用來量牛、羊、駱駝，魏晉可用於量鳥，至唐代可量人。

(91) 今日拿住一頭牛 (《元曲選·宜秋山趙禮讓肥》)

尾：始於唐代，用於量魚，元代仍有此用法，亦可用於量鷓鴣。

(92) 我贏的一尾好鮮魚 (戲三 118 李文蔚)

須：只用於量蝦。

(93) 輕裁蝦萬須，巧織珠千串 (散 170 關漢卿)

7. 屬性 (植物)

本：原為「植物的根部」，南北朝可用於量植物和書籍，元代也是這兩種用法。

(94) 東城之柳七十有二本 (文六 47 王惲)

株：原意是「根部」，自魏晉南北朝開始作為分類詞。

(95) 綠依依楊柳千株 (散 378 貫雲石)

科：原意為「根莖」，於魏晉南北朝開始作為分類詞，元代亦寫作「棵」。

(96) 去時節這一科松柏樹兒高似我 (戲四 85 鄭廷玉)

(97) 栽桑麻數百棵 (散 719 薛昂夫)

朵：原指「花朵」，唐代作為分類詞，可用於花朵或形狀類似的雲、山。

(98) 斷雲含雨峰千朵 (散 1250 馬致遠)

樹：漢代開始作為分類詞，元代相當於「株」。

(99) 共隔著一樹梧桐直滴到曉（戲一 512 白樸）

莖：原為「莖幹」，到了元代可用於纖細的物品。

(100) 三尺喙，數莖須（詞 1024 李齊賢）

節：可量竹。

(101) 且匹夫匹婦以一節孤竹，表見鄉曲（文六 117 王惲）

枝：原為樹枝，元代用法較廣。

(102) 恰便似一枝紅杏出牆頭（散 365 貫雲石）

8. 屬性（人）

介：用於自謙，元代大多用於擬古。

(103) 一介之士時命不偶（文一 339 元好問）

名：唐代開始作分類詞，元代開始用於一般人。

(104) 男冠女眾約數百名（文二 9 李志全）

位：表示對人的尊稱。

(105) 二位哥哥吃了筵席去（戲一 12 關漢卿）

員：魏晉時多量生員，元代時為對人的敬稱。

(106) 差一員首將，持請書來見（戲一 64 關漢卿）

頭：至唐代可量人。

(107) 鑽出一頭寇（《西遊記》（世德堂本））

9. 功用（書籍文章）

編：漢代就有的分類詞用法，用於量書。

(108) 暗誦《周易》一編（文五 251 胡祇遹）

冊：魏晉南北朝已有的分類詞。

(109) 放一冊冷淡淵明傳（散 1173 吳西逸）

章：量詩詞。

(110) 因作詞一闕，詩二章（文一 110 馮志亨）

首：量詩詞。

(111) 我臨行做了一首詞（戲一 219 關漢卿）

闕：用於量詞，因詞可分闕。

(112) 病中做詞一闕（戲五 487 賈仲明）

句：量唱詞、詩句、對白。

(113) 說幾句不傷時信口開合（《全元曲·端正好·自序》曾瑞）

則：元代時使用範圍較寬，通常指文字或話語。

(114) 這一則語，振祖師將墜之風（文一 97 李俊民）

卷：原為「捲曲」，後用於書簡、書籍，後來演變為計算書籍的分類詞，元代時也可以用於捲成一卷的物品。

(115) 放一卷崔氏春秋傳（散 1151 景元啟）

通：量文字作品、畫像等。

(116) 密詞九通，玉簡三面（文一 113 馮志亨）

藏：專量宗教經典。

(117) 又謹安置《三洞琅篇》一藏（文二 3 李志全）

品：用於佛經篇章。

(118) 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文一 421 元好問）

帖：量書法作品。

(119) 因復出坡公所書《寒食詩》二帖（文六 173 王惲）

軸：量書畫作品或有軸的物品。

(120) 出示所為詩一巨軸（文二 132 姚燧）

封：由「封閉」演變而來，量書信。

(121) 把一封家書改作詐休書 (散 1274 王氏)

宗：量文卷。

(122) 這一宗是什麼文卷？ (戲一 167 關漢卿)

緘：量書信，由動詞「封」而來。

(123) 誰想一緘書倒了為媒証 (戲二 248 王實甫)

簡：量書信。

(124) 一簡書和淚封 (散 1025 高棅)

函：本意為「封套」。

(125) 三寸舌為安國劍，一函書作固邊城 (戲一 645 高文秀)

條：文書、書信、分項列舉的內容。

(126) 蒙古色目人試經問伍條 (《通制條格》卷 5)

10. 功用 (建築物處所)

處：由「處所」演變而來，南北朝可量建築和地點，元代只能量建築。

(127) 恰寒食者有二百處秋千架 (散 201 白樸)

搭：也作「答」，量小塊地方。

(128) 向林泉選了一答兒清幽地 (散 1136 李茂之)

11. 功用（文化事物）

幀：唐代開始量佛像，後用於量畫。

(129) 報之以吳道子畫熾盛光佛一幀（筆·墨史）

曲：量樂曲、詞。

(130) 一曲蓮歌碧雲暮（散 7 楊果）

12. 功用（日用事物）

盞：從唐代開始就是量燈的分類詞，元代亦然。

(131) 對著盞半明不滅的孤燈雙眉皺（散 177 關漢卿）

碗：用法同「盞」。

(132) 去側首見一碗燈（筆·喻世明言 36）

檠：本意為「燈臺」，引申為分類詞後，用於量燈。

(133) 姑舍一檠燈（詞 614 劉炳忠）

13. 功用（衣物織品類）

領：魏晉時可量各種布料，元代只能量衣服和席子。

(134) 穿一領布衣（散 150 馬彥良）

件：唐代開始用於衣服，元代使用的情況增加。

(135) 那廝雖穿著幾件蛇蠍皮（戲一 90 關漢卿）

頂：可量帽子、頭巾等。

(136) 帶一頂溫公帽（散 416 張養浩）

被：由「覆蓋」意引申為量衣物的量詞。

(137) 各賜黃金雲羅官服一被（文九 513 姚燧）

床：用來量被子。

(138) 一床錦被權遮蓋（戲一 524 白樸）

14. 功用（交通工具）

乘：元代使用「乘」有仿古的意味，因為「輛」已經廣泛使用。

(139) 送車千乘（文十 60 趙文）

輛：元代量車的一般分類詞，又作「兩」。

(140) 五百貫用車一輛（文五 554 胡祇遹）

(141) 隨造江軸車餘千兩（文六 334 王恽）

艘：元代時可以計算各種船。

(142) 創舟百數十艘（文九 643 姚燧）

15. 通用

個：元代通用分類詞，包括人、房屋、衣物、動植物等都可以使用。

(143) 果必是個風流人物（散 29 王修甫）

枚：在漢至魏晉時成為通用分類詞，唐代時「個」取代「枚」的通用地位，元代的通用分類詞也是「個」，但「枚」的用例也很廣。

(144) 玉簪一枚，斑管一枚（戲二 306 王實甫）

16. 次通用

具：元代開始衰退。

(145) 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戲一 193 關漢卿）

(二)元朝和魏晉南北朝的比較

為了方便計算魏晉與元代的分類詞數量，以下將兩個時代的分類詞整合為表二，並將魏晉南北朝與元朝出現的分類詞區隔。

表二：魏晉南北朝與元代的分類詞比較

分類詞種類	魏晉	元代
形狀（長形）	條 莖 支 枝 道	條 柱 杆 管 竿 根
形狀（圓形、環形）	丸 粒 顆	顆 粒 丸 輪
形狀（塊狀）	塊	塊 方 駝
形狀（面形）	張 面 幅	片 面 張
形狀（外形相似）		峰
屬性（動物）	匹 頭 隻	匹 頭 尾 須
屬性（植物）	根 科 株 朵 本 挺 樹	本 株 科 朵 樹 莖 節 枝
屬性（人）	人 名 員	介 名 位 員 頭
功用（書籍文章）	卷 篇 首 本 冊 封 條	編 冊 章 首 闕 句 則 卷 通 藏 品 帖 軸 封 宗 緘 簡 函 條
功用（建築物處所）	所 處 區 間 幢	處 搭
功用（文化事物）	軀 龕 尊 曲	幀 曲
功用（日用事物）	牀 鈕 孔 牒	盞 碗 檠
功用（衣物織品類）	腰 領	領 件 頂 被 床
功用（交通工具）	乘 艘	乘 輛 艘
通用	枚	個 枚
次通用	口 件	具
總數	52	71

若單純計算數量的話，魏晉南北朝的分類詞有 52 個，元代的分類詞有 71 個，高於魏晉時期分類詞的數量。若將各項類別分開觀察，可發現除了面形、建築物處所、文化事物、日用事物、次通用五個類別外，元代每一類別的分類詞都多於魏晉，尤其是計算書籍的分類詞。

本節的統計可以得到兩個推論：一、分類詞從魏晉到元代呈現持續發展的趨勢。此一趨勢不違反壯侗派的主張。分類詞傳入北方漢語後，在北方漢語中持續發展是一個可能的進程。亦不違背漢語派主張分類詞起源於北方漢語，並在北方漢語中持續發展的事實。然而根據壯侗派的主張，即使北方漢語分類詞得以自行發展，作為傳播來源的南方漢語，分類詞應該要比北方漢語還要發達。本節所得到的統計並非如此。二、在「阿爾泰化」的框架下，我們期待可以看到北方漢語的分類詞在某一時期發生衰減，成為今日北方漢語的樣貌。從本節的統計可以看出，此一進程並非發生在元代；或即使此一進程在元代已發生，但仍未反映到其使用的語言形式上。

五、北方漢語分類詞的減弱

比較第三節與第四節可以顯示，北方漢語的分類詞到了魏晉以後仍然繼續發展，但是根據橋本萬太郎 (1985) 以及 Yue (2003) 等人的說法，現代漢語的分類詞之地理分布卻是南方多於北方。越往中國的北部，分類詞數量就越少，到了東干語，分類詞就只剩下「個」(Yue 2003: 85)。在甘肅的蘭州一帶，「個」也可以概括性的用於計算各項名詞；使用一項分類詞計算大多數物品的情形，也出現在山西與山東的一些官話方言；另外上海吳語也有類似情形 (Yue 2003: 85)。本文統計證實北方漢語分類詞的弱化在元代仍尚未發生，應是發生在元代之後，推測應是在清代滿族統治的兩百七十多年間發生。

元朝和清朝雖然都是阿爾泰語民族的政權，兩朝的語言政策卻有很大的差別，因而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以下是蘇瑞、李海英 (2011) 的研究發現。

(146) 元朝的語言政策：

- a. 為蒙古語創造文字：文字的創造，有助於語言的推廣。蒙古語本來沒有文字，忽必烈在位期間命人創造拼寫蒙古語的文字，並以此文字作為推廣蒙古語的媒介。

- b. 將「國語」推廣至學校教育：元朝在全國各地設立蒙古國子學，使用的課本也是譯為蒙古文的典籍，藉此擴展蒙古語的使用範圍。
- c. 用「國語」翻譯漢文典籍：元代曾將漢文的儒家典籍翻譯為蒙古文，以便蒙古子弟學習，如《元史》有以下記載：「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於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 d. 官方場合的國語政策：元代的官方場合，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祭祀或宣詔，蒙古語皆被廣泛使用，以鞏固蒙古語的崇高地位。
- e. 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元代境內的民族相當多元，蒙古人作為少數，為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便實行民族等級制度。元代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蒙古人在法律、科舉上有特權，而其他的民族也會因為通曉蒙古語而受到獎勵，故蒙古人以外的人皆會爭相學習蒙古語，並以了解蒙古語為傲。

至於清朝，語言政策與元朝有顯著的差異。清朝統治中國時，實行多語並行的政策，具體的內容摘要如下。

(147) 清朝的語言政策：

- a. 因地制宜：依照各地文化，推行不同的語言和文字作為通用語。在滿族人口的群聚地（主要是東北三省），以滿語為通用語；在蒙古族人口的群聚地，以蒙古語為通用語。
- b. 將漢語標準化：雖然清朝曾對漢人實行「薙髮易服」等同化政策，但並未要求漢人學滿語。相反地，當局積極地向漢人群聚地推廣以北方漢語為基礎的官話，特別是方言與官話互通性較小的閩、粵一帶。同時也編纂《康熙字典》以規範漢語的語音和文字，確立漢語作為社會共通語的地位。
- c. 多種官方語言：漢語、滿語、蒙古語皆為官方語言，可在朝廷上使用。

這兩種語言政策產生了兩種結果。元代的蒙古語政策，使得蒙古語與漢語之間產生了一上一下的社會地位區分。蒙古語屬於官方語言，社會地位較高；漢語則為民間語言，社會地位較低（蘇瑞、李海英 2011）。同時元代的蒙古語大部分僅流通在官方場合，較少普及至民間。而且元代時間較短，僅有九十多年，因此蒙古語不具分類詞的語法較難影響漢語，也較難受漢語影響（徐丹、傅京起 2011）。

滿語雖有分類詞可與數詞、名詞連用，但經常省略，例如「六本書」「ninggun bithe（六書）」、「兩個人」「juwe niyalma（二人）」、「六頭牛」「ninggun ihan（六牛）」。孫明 (2010) 因此指出滿語的數詞可直接修飾名詞，滿語分類詞的數量也極為有限。而且滿族統治中國近三百年，因此可推論滿語的分類詞為借用自漢語的語法，而非其固有的詞彙（陳甚安等 2024）。

由此我們可推測出一項假設，阿爾泰語區和中國北方在歷史上的交流，使得北方漢語和阿爾泰語言影響了彼此。假如北方漢語確實因為「阿爾泰化」而減少分類詞，那麼阿爾泰語言也有可能吸收漢語分類詞的概念而產生分類詞（陳甚安等 2024）。清朝統治中國近三百年，漢語定為官方語言，口語與文書都有這兩種語言。而且滿人大量入關，與北方漢人住在相同聚落，漢化的程度極深，對北方漢語的影響程度亦然。

六、結論

在漢語語族中，北方漢語分類詞的數量明顯不如南方漢語。文獻中有學者以此為證據，主張漢語分類詞的發展是受壯侗語影響。壯侗先影響了鄰近的南方漢語，再擴散至北方，因此分類詞在漢語中才呈現出「南強北弱」的情形；換言之，北方漢語分類詞應是自始即弱，持續至今。然而，Her & Li (2023) 提出多方論證，顯示分類詞應源於北方漢語，進而影響南方漢語與壯侗語，並對於漢語分類詞「南強北弱」的分布提出解釋：北方漢語後期因與阿爾泰語系接觸而產生「阿爾泰化」，分類詞才因而減少；換言之，北方漢語分類詞應是從無到有，從有轉強，而後才從強轉弱。本文主旨在於檢證此項假說。

北方漢語分類詞最早確切出現於上古金文，在魏晉南北朝趨於成熟。因此，本文首先檢視魏晉時期分類詞的數量，確定此時分類詞數量已堪稱豐富，超過 50 個。在此之後，分類詞因阿爾泰化而減弱較可能發生於元朝，因為此時受蒙古族的統治。然而，本文檢視元代分類詞的結果發現，此時的分類詞數量不減反增，比魏

晉時期還多出 19 個。在現代漢語中，北方的分類詞的確少於南方，因此我們比較了元、清兩個異族王朝接觸漢語的過程（蘇瑞、李海英 2011），推測清朝滿語接觸漢語的程度較深，而元朝蒙古語較淺。北方漢語在分類詞上的阿爾泰化，應該主要發生於清朝而非元朝，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證實此項推測。

引用書目

- 王 力 Wang Li, 《漢語史稿》*Hanyushi gao*,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3。
- 白 冰 Bai Bing, 〈宋元時期個體量詞的變化和發展〉“Song Yuan shiqi geti liangci de bianhua he fazhan”, 《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Shanxi gaodeng xuexiao shehui kexue xuebao*, 13.7, 太原 Taiyuan: 2001, 頁 106-109。
- 何萬順 Her One-soon、林昆翰 Lin Kun-han, 〈分類詞與量詞的區分：以臺灣華語為例〉“Fenleici yu liangci de qufen: yi Taiwan Huayu wei li”, 《漢語學報》*Hanyu xuebao*, 4, 武漢 Wuhan: 2015, 頁 56-68。
- 吳福祥 Wu Fuxiang、馮勝利 Feng Shengli、黃正德 C.-T. James Huang, 〈漢語「數+量+名」格式的來源〉“Hanyu ‘shu+liang+ming’ geshi de lai yuan”,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5, 北京 Beijing: 2006, 頁 387-400。
- 李若暉 Li Ruohui, 〈殷代量詞初探〉“Yindai liangci chutan”, 《古漢語研究》*Gu Hanyu yanjiu*, 2, 長沙 Changsha: 2000, 頁 79-84。
- 步連增 Bu Lianzeng, 〈南方民族語言的名詞分類詞和數詞分類詞〉“Nanfang minzu yuyan de mingci fenleici he shuci fenleici”, 《民族語文》*Minzu yuwen*, 1, 北京 Beijing: 2011, 頁 48-54。
- 孫 明 Sun Ming, 〈關於漢語滿語量詞的比較研究〉“Guanyu Hanyu Manyu liangci de bijiao yanjiu”, 《民族翻譯》*Minzu fanyi*, 3.1, 北京 Beijing: 2010, 頁 72-75。doi: 10.13742/j.cnki.cn11-5684/h.2010.01.005
- 徐 丹 Xu Dan、傅京起 Fu Jingqi, 〈量詞及其類型學考察〉“Liangci ji qi leixingxue kaocha”, 《語言科學》*Yuyan kexue*, 10.6, 徐州 Xuzhou: 2011, 頁 561-573。
- 張 頴 Zhang Cheng, 《類型學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Leixingxue shiye de Hanyu mingliangci yanbian shi*,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12。
- 張公謹 Zhang Gongjin, 〈論漢語及壯侗語族諸語言中的單位詞〉“Lun Hanyu ji Zhuangdong yuzu zhu yuyan zhong de danweici”,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Zhongyang minzu xueyuan xuebao*, 4, 北京 Beijing: 1978, 頁 14-30。doi: 10.15970/j.cnki.1005-8575.1978.04.003
- 梁 敏 Liang Min, 〈壯侗語族量詞的產生和發展〉“Zhuangdong yuzu liangci de chansheng he fazhan”, 《民族語文》*Minzu yuwen*, 3, 北京 Beijing: 1983, 頁 8-16。

- 陳孟英 Chen Meng-ying、謝妙玲 Hsieh Miao-ling、何萬順 Her One-soon，〈台灣閩南語分類詞之檢驗〉“Taiwan Minnanyu fenleici zhi jianyan”，《語言暨語言學》*Yuyan ji yuyanxue*，21.3，臺北 Taipei：2020，頁 375-407。doi: 10.1075/lali.00065.che
- 陳甚安 Chen Shen-an、唐威洋 Marc Allasonière-Tang、梁永平 Liang Yung-ping、何萬順 Her One-soon，〈阿爾泰語言中分類詞的起源與分布〉“A’ertai yuyan zhong fenleici de qiyuan yu fenbu”，《中國語言學報》*Zhongguo yuyanxue bao*，52.2，香港 Hong Kong：2024，頁 456-479。doi: 10.1353/jcl.2024.a929996
- 彭文芳 Peng Wenfang，〈元代量詞研究〉*Yuandai liangci yanjiu*，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Guangxi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2001。
- 黃載君 Huang Zaijun，〈從甲文、金文量詞的應用，考察漢語量詞的起源與發展〉“Cong jiawen, jinwen liangci de yingyong, kaocha Hanyu liangci de qiyuan yu fazhan”，《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6，北京 Beijing：1964，頁 432-441。
- 劉世儒 Liu Shiru，〈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Wei Jin Nanbeichao liangci yan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5。
- 蔣穎 Jiang Ying，〈漢藏語系語言名量詞比較研究〉*Han Zang yuxi yuyan mingliangci bijiao yanjiu*，北京 Beijing：民族出版社 Minzu chubanshe，2009。
- 鄭邵琳 Zheng Shaolin，〈魏晉南北朝石刻名量詞研究〉*Wei Jin Nanbeichao shike mingliangci yanjiu*，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Huadong shifan daxue boshi lunwen，2013。
- 橋本萬太郎 Hashimoto Mantaro 著，余志鴻 Yu Zhihong 譯，〈語言地理類型學〉*Yuyan dili leixingxue*，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85。
- 蘇瑞 Su Rui、李海英 Li Haiying，〈中國歷史上非漢族王朝的語言地位規劃〉“Zhongguo lishi shang fei Hanzu wangchao de yuyan diwei guihua”，《長江學術》*Changjiang xueshu*，6.3，武漢 Wuhan：2011，頁 133-142。
- Adams, Karen L. “The Influence of Non-Austroasiatic Languages on Numeral Classification in Austroasiati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1.1, 1991, pp. 62-81. doi: 10.2307/603749
- Behr, Wolfgang. “Classifiers, Lexical Tone, Determinatives: A Look at Their Emergence and Diachrony in Old Chinese and Beyond,” handout from Diachrony of CLF Workshop, 11 March 2009, Wassenaar: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 DeLancey, Scott. “Toward a History of Tai Classifier Systems,” in Colette Craig (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Categorization*

- and Noun Classification, Eugene, Oregon, October 198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6, pp. 437-452. doi: 10.1075/tsl.7.26del
- Erbaugh, Mary S. "Taking Stock: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oun Classifiers Historically and in Young Children," in Colette Craig (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Categorization and Noun Classification, Eugene, Oregon, October 198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6, pp. 399-436. doi: 10.1075/tsl.7.25erb
- Hashimoto, Mantaro J. "The Genealogy and the Role of the Classifier in Sino-Tibeta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7, 1977, pp. 69-78.
- Her One-soon.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Implications," *Lingua*, 122.14, 2012, pp. 1668-1691. doi: 10.1016/j.lingua.2012.08.012
- _____. "Structure of Numerals and Classifiers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Cross-Linguistic Implica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8.1, 2017, pp. 26-71. doi: 10.1075/lali.18.1.02her
- Her One-soon, Harald Hammarström, and Marc Allasonnière-Tang. "Defining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Identifying Classifier Languages of the World," *Linguistics Vanguard*, 8.1, 2022, pp. 151-164. doi: 10.1515/lingvan-2022-0006
- Her One-soon and Li Bing-tsiung. "A Single Origin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Hypothesis," in Marc Allasonnière-Tang and Marcin Kilarski (eds.), *Nominal Classification in Asia and Oceania: Functional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23, pp. 113-160. doi: 10.1075/cilt.362.05her
- Her One-soon and Tsai Hui-chin. "Left Is Right, Right Is Not: On the Constituency of the Classifier Phrase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1.1, 2020, pp. 1-32. doi: 10.1075/lali.00046.her
- Huang Shuanfan. *Chinese Grammar at Work*.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 doi: 10.1075/scld.1
- Huang Yu-hsin, Her One-soon, and Stano Kong. "Identifying Sortal Classifiers in Hong Kong Cantone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Taichung: Tunghai University, 2024.
- Huffman, Franklin E. "Thai and Cambodian—A Case of Syntactic Borrow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3.4, 1973, pp. 488-509. doi: 10.2307/600168
- Jenks, Peter Spiros Eric. "The Hidden Structure of Thai Noun Phrases,"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 Jones, Robert B.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0.1, 1970, pp. 1-12. doi: 10.2307/598428
- LaPolla, Randy J.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nitic Language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5, 2010, pp. 6858-6868. doi: 10.1016/j.sbspro.2010.05.036
- _____. "Overview of Sino-Tibetan Morphosyntax," in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22-42.
- Lu Tian-qiao. *Classifiers in Kam-Tai Languages: A Cognitive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Boca Raton, FL: Universal-Publishers, 2012.
- McWhorter, John. *Language Interrupted: Signs of Non-Native Acquisition in Standard Language Gramm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5309805.001.0001
- Morev, Lev N. "Some Afterthoughts on Classifiers in the Tai Languages," *Mon-Khmer Studies*, 30, 2000, pp. 75-82. doi: 10.15144/MKSJ-30.75
- Peyraube, Alain. "On the History of Classifiers in Archaic and Medieval Chinese," in Benjamin K. T'sou (ed.), *Studia Linguistica Serica*.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pp. 134-145.
- _____. "Some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fiers," *Santa Barbara Papers in Linguistics*, 3, 1991, pp. 106-126.
- Sagart, Laurent, Guillaume Jacques, Lai Yunfan, Robin J. Ryder, Valentin Thouzeau, Simon J. Greenhill, and Johann-Mattis List. "Dated Language Phylogenies Shed Light on the Ancestry of Sino-Tibetan," *PNAS*, 116.21, 2019, pp. 10317-10322. doi: 10.1073/pnas.1817972116
- Wang Lianqing.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4.
- Yue, Anne O. "Chinese Dialects: Grammar," in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84-125.

Development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Northern Chines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ei-Jin-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Yuan Dynasty

**Huang Tsung-chia¹ Li Bing-tsiung¹ Anthony Chi-pin Hsu²
Her One-soon^{2, 1*}**

¹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²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It has been debated whether sortal classifiers originated in Chinese and then influenced Tai-Kadai or vice versa. One piece of evidence supporting Tai-Kadai as the origin is the higher number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modern southern Chinese, compared to northern Chinese, suggesting that Tai-Kadai classifiers first influenced southern Chinese and then the feature diffused northward. However, Her & Li (2023) provide evidence supporting northern Chinese as the origin, arguing that later interactions between northern Chinese and the Altaic languages led to the “Altaicization” of northern Chinese, resulting in a reduction in classifier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is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respective classifier data from the Wei-Jin-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Yuan Dynasty. Classifiers in Chinese matured during the time of the Wei-Jin-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first establish the number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northern Chinese during this period as a basis for comparison. We then examine the Yuan Dynasty, which was under Mongol rule. The result of comparing the Wei-Jin-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Yuan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clearly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northern Chinese increased rather than decreased in the Yuan. This indicates that a trend of growth in Chinese sortal classifiers, from nonexistence to abundance, occurred over the two and a half millennia before the Yuan Dynasty. The decline must have taken place after the Yuan Dynasty,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nearly three centuries of Manchu rule in the Qing Dynasty.

* Email address: onesoon@gmail.com, hero@thu.edu.tw

Keywords: sortal classifiers, numeral classifiers, Altaicization, Wei-Jin-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Yuan Dynasty

（收稿日期：2024. 2. 15；修正稿日期：2024. 5. 1；通過刊登日期：2024. 8. 21）

